

贵州省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员会 编

贵州文史资料选粹



政治军事篇

上卷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州省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员会 编

贵州文史资料选粹



政治军事篇 上卷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州文史资料选粹》编辑委员会名单

主 任：王正福

副 主 任：陈海峰 吴嘉甫 王录生

委 员：姚钟伍 邓洪泰 蒙秋明 耿晓红 赵 强

程鹏飞 王晓林 张燕平 龚晓宽 殷福保

韦启光 赵少伏 唐文元 孙若芹 王恒富

史继忠

主 编：姚钟伍

副 主 编：唐文元 王晓林

责任编辑：程亦赤 龙建人

编 辑：唐文元 王恒富 史继忠 方家印 刘 丽

史 永 平 瑶

目 录

(上 卷)

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

- 清末贞丰仁学会的成立及其影响····· 刘灿文 刘灿武(3)
- 严修在贵州····· 马凤程(5)
- 贵州自治学社革命斗争回忆录····· 陈纯斋 遗稿(18)
- 贵州自治学社和宪政会的斗争····· 萧子有(33)
- 王宪章在武昌首义前后····· 陆心一(42)
- 贵州陆军小学学生参加辛亥起义经过····· (47)
- 贵州辛亥革命的亲历和见闻····· 胡 刚 遗稿(55)
- 贵州民党痛史····· 周素园 遗稿(81)
- 贵州辛亥革命先行者张忞事略····· 吴雪涛 张 洵(151)
- 滇黔道中手札····· 钟山玉 遗稿(159)
- 平刚先生生平事略····· 陈恒安(174)

护国护法及北伐战争

贵州在护国运动中的几个历史文件

- 贵州省政协文史办公室 搜集(195)
- 记护国运动时期杨镜如先生爱国断指事迹····· 杨竹芬(201)
- 贵州护国前夕的梅园会议····· 罗焕奎 口述 周杏村 整理(203)



护国、护法运动中的王伯群 王保志宁(205)
护国战争中北路黔军作战经过及入川失败始末

..... 杜叔机 遗稿(207)
护国之役黔军在东路作战经过 张立安(235)
吴传声奋勇攻沅州 贺梓济 遗稿(238)
护法运动中孙中山致贵州电文选 (241)
难忘的会见

——回忆孙中山先生的一次谈话 李侠公(243)
黔军加入国民革命军北伐简述 陈弦秋(245)
黔军北伐部分就职电文 (247)
袁系黔军之瓦解和第十军参加北伐 魏幼安(251)
黔军王天培部参加北伐始末 任景周(259)
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参加北伐战争的始末 傅顺章 整理(266)
缅怀欧百川副省长 惠世如 王林岗 朱煜如(277)

兴义系桐梓系军阀及吴鼎昌主黔

刘显世集团内部斗争散记 桂百铸(285)
我所亲见的袁祖铭和“定黔军” 丁宜中(297)
贵州“民九事变”亲历记 林子贤(308)
王天培倒谷(正伦)拥袁(祖铭)及与袁的矛盾 王天锡(313)
桐梓系统治贵州的回忆 王家烈(323)
王文华、袁祖铭、周西成以及李燊的兴起和覆亡 胡寿山 遗稿(345)
王(家烈)犹(国材)之战始末 吴剑平 遗稿(374)
对吴鼎昌主黔七年的回忆 尚传道(385)

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

清末贞丰仁学会的成立及其影响

刘灿文 刘灿武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吴嘉瑞在贵州贞丰组织“仁学会”。许多青年都踊跃参加了这个进步组织。现据贞丰九十二岁高龄的姜剑纯老先生的回忆和参阅有关资料,将“仁学会”的成立及其影响,略述于下。

当时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变法维新思想,在国内极为盛行。吴嘉瑞是力主变法的人士之一。他是湖南长沙人,常纵谈改革,毫无避讳,言人之所不敢言,在社会上颇有影响。1898年,吴嘉瑞到贵州贞丰来任白层河厘金总办,同来者有游击王子厚和曾醉轩(湖南人)等。到任不久,便在贞丰城内组织一进步团体,名曰:“仁学会。”会址设在城东的文昌宫(现在的敬老院),吸收当地青年参加,向青年们讲解国内政治时事,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同时,还讲授算学等新的课程。他的讲解十分生动,对增长青年们的知识,启发人们觉悟,开阔人们的眼界,起了积极的作用,使人们的耳目为之一新。当时加入“仁学会”的贞丰青年,现能记忆起来的有胡刚(寿山)、詹德煊(麟初)、钟振玉(子俊)、钟振声(子光)、孟光炯(瑞廷)、孟广仁(泽民)、姜瑞熊(辑五)、饶存厚(焕彩)、孔广钧(陶安)、梁士荃(名卿)、刘楷(希文)、傅良弼(佐卿)和邓永旭等。吴嘉瑞对他们传播了维新学说,分析了国家的形势,阐明了救亡图存的道理,对这般青年进行了启蒙教育,为他们以后从事革命活动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在清末,偏僻边远、文化闭塞的贞丰县,能有“仁学会”这样的进步组织,确是难能可贵的。

变法失败后,慈禧重新听政,光绪被禁,康、梁外逃,“六君子”被杀。吴嘉瑞也因在贞丰组织“仁学会”,宣传变法维新之故,被撤职“轿杠”(按清例:一定的等级官员犯罪,不直接锁拿本身,只锁拿轿杠以示上刑),拿问进省。后来贵州巡抚王毓藻因见清廷对维新人物,已不大过问追查,并得各方援助,便对吴嘉瑞的问题未加深究,不了了之。

继吴嘉瑞来贞丰任白层河厘金局总办的是原安龙坡脚厘金局总办张翰。他亦系湖南人,与吴同乡。擅长书法,左腕挥毫,笔力遒劲,曾将其所作

七绝一首书赠贞丰名医姜讯之。诗曰：“南明河上斗芳菲，春水桃花燕子肥，日暮踏青人尽醉，野花斜插帽檐归。”足见其诗文功力之深。这位张翰就是张百麟（石麟）的父亲。

张百麟青年有为，思想进步，二十三岁时曾拜吴嘉瑞为师，专心致力于新知识的探求。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癸卯），他来贞丰探亲，结识了“仁学会”的青年们，聚会时畅谈国家大事及革命理想，甚为投契，加之都是吴嘉瑞的学生，便结成志同道合的朋友。这些人后来在贵州光复革命运动中，多成为骨干，起着先导作用。

由于“仁学会”和张百麟的思想影响，致使贞丰的许多青年看清了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和自己担负的责任，纷纷外出，寻找学习深造或为国效力，施展抱负的机会。有的到贵阳进陆军小学或法政学堂；有的到日本去留学；有的到报社任编辑或在学校教书；有的参加了军政工作。这些青年外出后，眼界更为开阔，特别是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逐步由维新思想发展为民主革命思想。1907年贵州自治学社在贵阳成立，当时参加自治学社的贞丰青年很多，又多是当年贞丰“仁学会”的成员，或者是受到新思想影响的人，他们在自治学社的领导下，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其中有一些曾参加过1911年11月4日的贵州光复起义，胡刚、钟振玉等在起义中起了重要作用，傅佐卿担任过自治学社全省训练乡兵的南路指挥；胡刚、李燊、杨汉初等又参加护国、护法之役。1913年（民国二年），孔陶安、陈思敬、尹哲卿等组织一批青年应募参加龙济光的卫队赴广州，到达广州后，他们就秘密到香港与孙中山联络，部署克期起义。詎料事机不密，惨遭广东都督龙济光的杀害。留在贞丰继续坚持革命活动的饶毅、王子林、曾应棠、蔺炳清、陈立先、梁辉廷等人也被株连，先后为中国的民主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创办“仁学会”的吴嘉瑞，他的思想也随着局势不断变化而发展，他从一个主张变法维新的改良主义者，进而成为积极参加贵州自治学社的民主革命活动者，曾担任过自治学社创办的法政学堂监督。在他任镇远知府期间，云贵总督李经羲，因受宪政党的蒙蔽，路过镇远时，向吴问及张百麟、周培艺是否革命党人。吴一面代为辩解，一面飞函通知张、周注意提防。张、周因而免遭宪党暗害。

在清末民初，贞丰许多青年之所以能在那风云变幻的时代，认清国家大势，顺应历史潮流，接受维新思想，进而参加革命活动，并为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奋斗不息，乃至英勇献身，追本溯源，实乃早就受到“仁学会”的影响。

（原载《贵州文史资料》第15集）

严修在贵州

马凤程

严修(1860—1929),字范孙,天津人,于1894—1897年以翰林院编修出任贵州学政。学政,是主管一省学务的官吏,约相当于现在的教育厅长。严修在贵州三年,主要办了以下几件事:一、创办资善堂书局和经世学堂;二、在全省范围内巡回举行科举考试;三、向朝廷呈送了《奏请设经济专科折》。

严修是一个有维新思想的清朝官吏。他在贵州期间,在倡导新学、奖掖后进、传播知识方面,都有所建树。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严修热爱祖国,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他在贵州任期内所采取的一些兴革措施,以及他向朝廷提出的维新变法建议,都是出于希望振兴国家的热切愿望。此外,严修勤谨好学,他除了每天坚持阅读和写日记外,还孜孜不倦地学习英语和数学;这种精神和作风在清朝官吏中是很少见的。正由于这些原因,严修历来受到贵州学术文化界人士的尊崇和好评。

本文试以严修在贵州任期内写的《蟾香馆使黔日记》(以下简称《日记》)为基础,结合其他方面史料,对严修在贵州三年的情况作一个粗略的叙述,供读者参考。

一、初到贵州

严修于1894年农历九月十六日离开北京前来贵州。当时严修三十四岁。

严修来贵州之年,正值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时^①。严修于农历十月十

^① 中日甲午战争从1894年7月开始,8月1日正式宣战,到1895年3月结束。



九至二十一日途经湖北荆州时,听到日寇侵占我旅顺的传闻,不胜忧虑。他在日记中写道:“奈何奈何,私心祷祝惟冀所传之诬耳,否则大局不堪设想。”“虽疑信参半,然思此言果信,则全局瓦解,不止一身一家之私惧也。”当时,他明确意识到自己所忧虑的是国家大局,而不是个人身家利害。

严修在国家遭受外侮的严重时刻,并不消极悲观,而是积极地希望有所作为。他在来贵州途中写了一些即兴诗,抒发了自己的抱负,如《宿荆门书院》中有一首云:“十月霜天踏早寒,梦中惊起促征鞍,主人饥渴求贤意,日昃才闻具一餐。”表达了他远道求贤的热切愿望。又如《楚山》一诗云:“平居好谈山,苦说山居好。山行今来半,看山山已饱。楚山岂不佳?劳人惜草草。人自劳兮山自闲,山灵不语笑解颜。登山不登绝顶处,如入宝山徒手还。”这首诗表达了他不畏险阻攀登高峰的志趣,同他在二十四岁时(1884)在《留别陈奉周先生》一诗中所说的“男儿胆气须磨炼,要向风波险处行”^①,在思想境界上是一致的。

严修水陆兼程,整整走了两个月,才于农历十一月十六日由湖南晃州进入贵州玉屏县境内,之后于二十六日到达贵阳。

作为学政,严修上任后自然首先关心的是贵州学界的状况。他在向朝廷拜发了《到黔报接印日期折》后,即亲自拟发了一些有关训勉、引导士子读书的文告,如《劝学示谕》《举优报劣通飭》等,并出了观风策论四道以课士。从严修手拟的这些文告、奏折和他写给天津的家信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初到贵州,就对教育方面的兴革有所考虑和设想。

第一,指出了存在于士子中的通病。严修在《劝学示谕》中说:“方今士习之蔽,大要有二:朝而时文,夕而试律,迂道德而不谈,束经史而不观,所用非所习,所习非所用,其蔽一也;口则诗书,心则货利,身则庠序,行则穿窬,言不能顾行,行不能顾言,其蔽二也。”这里,严修所指出的存在于士子中的两个通病:用非所学、言行不一,是当时科举制度下普遍存在的现象,严修的看法是切中时弊的。

第二,提出了补偏救弊的办法。严修在《到黔报接印日期折》中表示:要“严去取以核真才,慎关防以祛诸弊。揆圣贤立敬之意,有行重于有文;体朝廷眷士之心,所习必课请所用”。这里他提出的教育和选拔士子的两个原则:行重于言、学以致用,虽然还不能从根本上补偏救弊,但也不失为对症下药的良方。

^① 均见《严范孙先生古近体诗存稿》。

第三,决意实行某些改革。严修在农历十二月十七日写给天津亲友的信中说:“闻此间士习朴愿,积弊亦较他处为轻,惟地瘠民贫,无力读书者多,藏书之家亦绝少,似厘剔较易,而培养则甚难,惟有勉策弩钝,循序渐进,仍度德量力,无至颠蹶。”接着他表示:“凡通例皆然,不能骤改者,仍甚其旧;其琐屑太甚,及人所患苦者,亦不能一无裁革,总期不立异,亦不苟同,庶可心安而理得。”^①革除封建教育中的弊端,当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不立异,亦不苟同”这句话,很能说明严修当时的思想特点,即:他既不能离开国朝既定的教育制度和方针去另搞一套,也不愿对一些令人不能容忍的弊端熟视无睹。他要在不违背根本制度的前提下做一些兴利除弊的事情。

二、建立资善堂书局

严修到任后着手必办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筹建官书局。

建立书局,现在看来事同寻常,但在19世纪末,对于地处偏僻、交通梗塞、文化落后的贵州来说,能够首先为黔中士子建立一个书局,倒是一件大有意义之举。须知当时贵州书籍奇缺,尤其是讲维新、谈西学的书更属凤毛麟角。“上海制造局之译籍,已难能而可贵,求更进于此者,乃无有矣”^②。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后,有关抗御外侮、变法图强的著作和期刊日益增多,而这些读物只有通过书局才能大量传播到士子手中。严修是要求学界士子关心天下大事的,他在以“辨志明师、评文匡时”为题的观风策论中就语重心长地指出:“知古而不知今,王充笑之。读书将以致用也。……范文正作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愿诸生效之”^③。这些话也可以看作是他创办书局的目的和宗旨。

严修上任后未及一月,就同当时的贵阳知府文仲瀛商定:仿天津书局例,在贵阳开设官书局。天津书局创立于光绪八年(1882年),历年购进各省图书到直隶按原价发售,深受人们欢迎。严修对此是很了解的。他首先为书局起草了管理章程,拟定了购书计划,又亲手缮写了书目和价格,“凡书三十四种,为册九千有奇,价一千串有奇”^④。书局于1895年开设,地址

① 见《蟬香馆手劄》。

② 周素园:《贵州民党痛史》第三章。

③ 《蟬香馆别记》。

④ 见《蟬香馆使黔日记》(第一册)。以下凡引自此日记者,不再一一注明。

在贵阳资善堂(今慈善巷),聘请举人雷廷珍为书局董事,“月薪十六金”。

严修在贵州三年期间,经常关心着这个书局。他多次同书局人员交谈(贵州辛亥革命先驱者张铭当时在这个书局任职,曾受到严修接见),了解书局的存书、售书情况,并为书局陆续增订了购书计划。从所购书籍的内容看,前后有一个较大的变化:1895年书局刚建立时,严修以“贵州提督学署”名义翻刻了天津书局编印的《各省官书局书目》,并以这个书目为蓝本购进图书;这时所购图书大部分是经、史、子、集,只有很少一些自然科学书籍(如《数理精蕴》《几何原本》《算学启蒙》)和早期改良派的著作(如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1896年,严修先后收到亲友从北京、天津寄来的广学会书目、格致书室书目和梁启超编写的《西学书目表》《读西学书法》,这使严修眼界大开,他清醒地认识到:“近来时局日新月异,泰西诸学,俱为当务之急^①。”他反复阅读了这些书目特别是梁启超编写的西学书目,并参照《西学书目表》重新为书局制订了购书计划。他在1897年农历二月二十一日日记中写道:“与澄兄议买西学书单,为书局谋也。”二十二日又记:“接写书单,自己至酉乃毕。”这次所开列的西学书目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然科学书籍,其中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地质、天文、医学、动植物等;另一类是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历史的书籍,如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揽要》《时事新论》,魏源的《海国图志》,马建中的《适可斋纪行》,徐继畲的《瀛环志略》等。此外,还有一些维新派人士的著作,如康有为的《公车上书记》,郑观应的《盛世危言》等。

1896年8月9日,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在上海发刊,每月出三册,鼓吹维新变法。这是严修最喜欢阅读的报纸。1897年农历三月八日,严修写信给贵阳知府严绍光,提议以资善堂书局作为《时务报》的代派处。此事很快得到实现。

这样,资善堂书局实际上就成了传播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和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一个重要场所。

与此同时,严修又动员镇远知县杨子深在该县建立官书局,同时为黔西、玉屏等县书院拟定议购书目,为威宁书院选购书籍。从此,贵州学界士子读新学书籍逐渐蔚成风气。

① 1898年《上尹琅若师》。

三、巡回举行科举考试

学政负有通过考试选拔士子的重要任务。严修上任后两个多月,就出发到全省各府、州巡回举行科举考试。

按清制,贵州全省在贵阳、安顺、兴义、大定(今大方)、遵义、黎平、都匀、石阡、镇远、思南、思州(今岑巩)、铜仁十二府和平越(今福泉)直隶州设有十三个考棚(考棚,类似今天的考区或考点)。考试分文、武两科,文科考八股文、试帖诗^①等,武科考弓、刀、石(即所谓“拉弓、举刀、抱石之技”),并默念《武经》。

当时应试者主要是各县童生和生员。童生又称儒童,就是尚未取得入学资格的。童生经过县试、府试、院试,被录取后才算正式入学成为生员,亦即人们通常说的“秀才”。做了秀才,就具备了起码资格在省城参加每三年秋天举行一次的乡试(“秋闱”),考中后为举人。学政到全省各府、州巡回考试,其任务大致有二:一是主持院试,录取一部分已通过县试、府试的童生正式入学成为生员;二是对已入学的生员进行科考,根据考试成绩好坏分别予以升降(成绩最好的为廪生,其次为增生;新入学的为附生),并选送生员中成绩优良的参加乡试。

严修在出棚之前,曾在《劝学示谕》中将考试选拔士子的要求昭告全省生童,指出:考试虽然“不得不视文章为进退”,但所需要的是“朴雅之才”,而非“浮华之士”,因而对应试者要“校其文艺以覩其所造”,“察其气质以验其所养”,“课其言论以测其浅深”,“密访其行谊以核其真伪”。这说明:严修并不是单凭八股文取士的。

严修在贵州三年,共到各府、州巡回考试三次:

第一次,自1895年农历二月六日至六月十三日,历时五个多月,先后到安顺、兴义、大定、遵义、贵阳等五棚(即所谓“上游五棚”)举行考试。

第二次,自1895年农历九月二日至1896年农历六月二十八日,历时九个多月,先后到平越、镇远、石阡、思南、铜仁、思州、黎平、都匀等八棚(即所谓“下游八棚”)举行考试。

第三次,自1896年农历七月三日至1897年农历正月十九日,历时六个

^① 试帖诗,也叫赋得体,以古人诗句或成语为题,冠以“赋得”二字,格式限制极严,大都为五言六韵或八韵的排律,在科举考试中采用。

多月,再次到“上游五棚”举行考试。1897年农历二月一日,严修向朝廷拜发了岁科考试完竣折。

严修在第一次到“上游五棚”考试完毕时,曾于1895年农历七月二十三日写给天津亲友的信中说:“贵州文风上游为优,上游五棚贵阳为最,虽无魁异绝特之品,而一二佳士文笔斐然,较之吾津,政不多让,惟边瘠之区,又当兵燹之后,士无恒产,家鲜藏书,闻见不阔,志向亦狭。谋道之志,终不胜其患贫之心,此则大逊吾乡而有教养之责者所当勤虑也^①。”严修对当时贵州文风的估计大致是符合实际的。这里他既肯定了贵州有人才,并不因为贵州贫穷落后而否定一切;又指出了贵州士子眼界不广、志向狭窄的缺点,从而更明确了自己应尽的职责。

值得注意的是,严修作为学政,虽然在主持科举考试中不能不忠实地执行朝廷赋予他的使命,但是他在具体作法上却实行了某些改革,而且在对人才的选拔上也表现了某种新的眼光。

首先,严修在主持考试中列入了“算学”一科(包括笔算和珠算)。据《日记》载,严修在安顺、贵阳、遵义、大定、兴义等地考棚,都招试算学生童。尽管应试者寥寥,但这件事却很有意义。按照我国封建社会“重义理轻技艺”的传统观念,数理化之类的自然科学知识历来遭到轻视,不能与儒家经典相提并论。严修在考试中列入“算学”一科,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士子重视自然科学,这对于改变当时社会风气是有积极作用的。

其次,严修在临场考试发题时,同时在另纸上书写几个问题要求应试者回答,如:家藏何书?所常读者何书?所最熟者、最好者何书?所宗仰者何人?所交游尤受益者何人?这种作法虽然只是考试中的枝节问题,但也可以看出严修总是力求对应试者的思想言行和爱好兴趣有更多的了解,而不是单凭八股文好坏决定取舍,从而达到拔擢真才的目的。

再次,严修在考试命题时,虽然也按照封建教育制度的要求,从《四书》《五经》和其他史书中大量选题,但同时也有意识地出了一些同当时时事政治有关的试题,如“论洋务”、“戒吸食洋药说”(“洋药”即鸦片)、“论西学之用与用之法”。他显然注意测验士子是否留心时务以及他们在这方面的认识水平。

最后,严修在评价和选拔士子时,不仅对那些熟读经史、诗文俱佳、资质聪颖的生童感到由衷的喜悦(他在《日记》中对这类生童频频发出“美才也”

^① 《蟾香馆手劄》。

的赞叹),而且对那些知时务、熟洋事(即知道一定西学知识,并了解外国情况)的生童也大为赞赏。例如他在1896年农历五月八日在黎平棚阅卷时,发现一位名叫温兆麟的文童,“颇知时务,尤熟洋事”,经过进一步了解,才知道这位文童因“久居广东之嘉应,故闻见颇多”,然而严修认为:“非留心者亦不能也”,最后便将温兆麟同另一位也知时务、熟洋事的文童同时录取。这件事说明:严修在选拔士子时,眼光已经不局限于只要求应试者通经史,还把知时务、熟洋事作为选拔的条件之一。这不能不是一个进步。

在巡回考试中,严修对那些名列前茅的生童,还奖以张之洞撰写的《尊经书院记》和周书昌编纂的《先正读书诀》^①。

严修在巡回考试中,除了选拔人才外,也进一步了解到存在于士子中的一些丑恶现象:其一是诉讼之风很盛,严修每到一地,几乎都收到许多控告不法生员和童生的诉状,诸如强占他人财产、霸占他人妻女、贪污纳贿、打死打伤人命等,对此,严修除了发出“讼风盛哉”的慨叹外,别无良策;其二是“枪替”之风很普遍,各地考棚均发现有以重金请人代考者,或专以代人考试谋生者,种种作弊手段不一而足,严修感到这种现象“防不胜防”。更重要的是,严修由此进一步体会到科举制度的腐败。他在1896年写给柯逊庵太守的信中曾慨叹说:“科举法之弊,人才之衰,至今斯极!若一无变通,似于作育之道亦有未尽^②。”他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不进行改革,就难以有效地选拔人才。

四、创办经世学堂

1897年,严修在全省进行巡回考试的基础上,根据各地生童考试成绩,选拔高材生40名入贵州经世学堂住斋肄业(其中:贵阳、贵筑两属选20名,省城外各属选20名)。学生免费入学,每生每月可领膏火银4两。学堂地址设在贵阳顺城街(即今之护国路)。

贵阳原有学古、正本、贵山3个书院。“经世学堂者,就学古书院改设,

^① 周书昌,山东济南人,乾隆三十六年进士,乾隆四十四年任贵州乡试典试官,他编的《先正读书诀》中辑录了我国历代名人治学的语录。

^② 转引自《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第9页。

仿四川尊经书院办法，而缩小其规模”^①，“虽名学堂，仍沿书院制而改良”^②。

四川尊经书院系张之洞于光绪元年(1875年)创办，学生为全川选拔的高材生，共一百名。尊经书院最重读经，虽然张之洞也倡导学生学西学(如天算、格致之类)，但认为必须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严修在办学思想上服膺张之洞，他不仅反复阅读了张之洞在督学四川时撰写的《辅轩语》《书目答问》《尊经书院记》，而且将这些书付梓印发，作为指导士子读书的重要读物。严修在致陶仲明的信中说：“中国之学，万劫而不可磨灭者，惟义理耳。西学虽明备，孔孟程朱之道不能畔也。义理之学愈深，西学之用愈实；孔孟程朱之道愈明，泰西之法愈见其可行”^③。显然，他和张之洞的看法是一致的。

不过，严修特别强调学以致用。他痛感国家急需有用之才，而专攻经史的原有书院已经不能适应需要。他在《劝学示谕》中说：“天下之治乱，视乎人才之盛衰。今日读书，他日致用，非止为进取也。”严修所说的人才，不仅要通经史，而且要懂时务，具备利国利民的实际知识和技能。“经世学堂”即寓有经世致用之意。这正是严修办学思想的进步之处。

经世学堂的创办，是严修办学思想的一次具体实践。严修亲自为经世学堂拟定了章程，凡十二则，除对学生的学、起居、请假等项制度作了明确规定外，还仿尊经书院办法，要求学生做省身日记、读书札记，规定每月“由院长调日记、札记及考勤簿核勤惰、定优劣”，最后由学政复核，“勤者酌奖，惰者初次批饬，再则罚半月饬，三则开除”^④。

经世学堂的课程以经史、数学为主，兼习时务、外国语。

严修聘请了对经学研究有素的举人雷廷珍兼任经世学堂院长和经学讲席。雷廷珍，字玉峰，绥阳人，光绪戊子(1888年)举人，著有《经学正衡》《文字正衡》等书。雷廷珍到经世学堂后，“经史之学于焉大倡”^⑤。

严修原拟从湖南聘数学教师，但湖南“算师因道远脩微皆不肯就聘”，于是，严修就亲自担任经世学堂数学讲席。

严修本人爱好数学，“平日于代数、几何致力最深”^⑥。他从二十岁起

① 周素园：《贵州民党痛史》。

② 《贵州通志·学校志》(六)。

③ 转引自《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第19页。

④ 《贵州通志·学校志》(三—四)。

⑤ 《贵州省地方教育》第一章第一节(1940年11月编印)。

⑥ 《蟾香馆别记》。